

# 大跃进与困难时期小城镇人口变动研究\*

李若建

(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 大跃进与困难时期, 小城镇的人口规模经历了一场大变动。从人口学的角度看小城镇建制的变化、人口自然变动异常和大量的人口迁移是产生人口变动的直接因素。从深层因素看导致人口变动的主要原因是大跃进与困难时期巨大的社会变迁、人民公社运动、大规模的行政区划变化和大跃进中的盲目建设。

**关键词:** 大跃进; 小城镇; 人口变动

**中图分类号:** C 9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639(2001)01-0124-08

从80年代初期开始, 小城镇研究风靡一时。虽然小城镇研究有较大的进展, 但是据笔者所见, 专门对大跃进与困难时期这一当代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特殊阶段的小城镇研究几近空白。近年来国内对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人口与社会研究开始出现, 有对当时人口损失的估计,<sup>[1],[2]</sup>有对当时婚姻生育的研究,<sup>[3]</sup>还有对人口迁移<sup>[4]</sup>与流动人口的研究<sup>[5]</sup>。对于当时城镇化已经有初步的研究,<sup>[6]</sup>但是其中没有涉及小城镇问题。本文的目的是描述当年小城镇人口的基本情况, 并且对一些问题作初步分析。

有几点要说明的是: (1) 本文研究的范围是在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建制镇; (2) 由于中国的人口统计口径问题, 在镇的行政范围内分为农业与非农业人口, 因此在本文中城镇总人口包括农业与非农业人口, 对镇的非农业人口则另外加以注明; (3) 由于资料收集的困难, 本文仅仅是一个初步的探索; (4) 为了说明问题, 本文的研究时间范围是大跃进开始前的1957年到困难时期结束后的1963年。

## 一、小城镇人口总量变化

时至今日对于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人口数量, 特别是人口损失程度还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 反映在小城镇人口数量上也是如此。据笔者所见, 在比较权威的工具书上, 对当年的人口有两种数据(见表1)。除了1957年与1958年的数据之外, 两种数据的差距不大, 考虑到资料的完整程度, 笔者选择《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88》的资料作为分析依据。

由于没有1957~1960年间全国小城镇的非农业人口资料, 因此在本段文字中, 讨论的

\*收稿日期: 2000-10-09

作者简介: 李若建(1956-), 男, 福建厦门人, 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教授。

是镇的总人口，包括农业与非农业人口。在大跃进期间，镇的总人口的增长是一个倒“U”型。总人口从1957年的3717万增加到1960年的4577万，增长了23.1%，1962年总人口下降到4056万人，比1960年降低了11.4%。一增一减，在大跃进与困难时期镇总人口还是略微增加，不过如果仅仅以小城镇非农业人口来考虑的话，情况可能有所差别。与此同期，1957~1960年全部城镇人口增长31.4%，1960~1962年下降了11.0%。<sup>[6]</sup>从这一比较可以看出，在城镇人口高速增长期间，城市部分的增长远高于小城镇，在下降期间的下降幅度则大体相当。这种情况说明，大跃进的城镇化高潮与回落，在小城镇方面虽然有一定的体现，但是没有城市那么突出。

表1 1957~1963年镇人口数量 单位：万人

年	《人口统计年鉴》数据		《人口年鉴》数据	
	总人口	非农业人口	总人口	非农业人口
1957	3717		3047	
1958	3892		3363	
1959	4552		4446	
1960	4577			
1961	4506	3599	4408	3517
1962	4056	3284	3964	3210
1963	4114	3400	4026	3326

资料来源：1. 《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88》，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第206页。

2. 《中国人口年鉴198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854页。

如果进一步具体到镇来看，镇与镇之间的人口变化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见表2），大体上可以分成4种类型：第一种是大起大落型，有的镇人口的变化非常巨大，例如浙江省萧山县城厢镇1961年的人口比1957年增加了111.7%，1963年的人口又比1961年减少了25.3%。第二种是比较平缓变化类型，例如上海市松江县松江镇1961年的人口比1957年增加了19.5%，1963年的人口又比1961年减少了19.7%。第三种是人口减少型，如云南省通海县秀山镇，在大跃进与困难时期人口一路下降，人口最少的是1960年，人口比1957年少45.6%。第四种是人口增长型，如福建省浦城县南浦镇在1957~1963年间，人口从3074人一直缓慢增长到3750人，平均年增长率3.4%。

表2 部分镇的人口数量 单位：人

镇	1957年	1958年	1959年	1960年	1961年	1962年	1963年
上海市松江县松江镇	51366	48944	52231	54618	61381	50111	49312
浙江省萧山县城厢镇	20766	37189	35085	41299	43957	33406	32844
福建省浦城县南浦镇	3074	3169	3264	3359	3454	3551	3750
云南省通海县秀山镇	13692	12455	11451	7446	8238	8647	8691

资料来源：1. 《松江镇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96页。

2. 《萧山县城厢镇志》，浙江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76页。

3. 《南浦镇志》（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藏书），第79页。

4. 《秀山镇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9页。

由于资料不足，因此无法断定在大跃进与困难时期，到底上述各种类型的城镇占的比重

多少。笔者收集到浙江省与陕西省 268 个有 1957 年与 1963 年非农业人口资料的小城镇, 在这些城镇中 54.1% 人口数量是下降, 45.9% 的小城镇人口数量上升。从这点看, 当时相当部分小城镇在大跃进与困难时期是处于城镇化水平下降的境地。表 3 反映的是浙江与陕西两省在 1957、1961、1963 三个年份小城镇的人口变化, 从中可以了解到在 1957~1963 年间, 小城镇人口变化是以波浪型的占大多数, 先升后降与先降后升的合计起来超过 70%, 由此可见当时城镇化过程的波动程度。虽然有些小城镇在大跃进与困难时期人口总的趋势是增加的, 但是更多的小城镇人口规模是不断下降的, 如果以比重看, 前者比后者高 10.2 个百分点。

表 3 浙江省、陕西省部分小城镇人口变化类型构成

人口变化类型		占全部城镇 比重(%)	人口变化类型		占全部城镇 比重(%)
1957~1961年	1961~1963年		1957~1961年	1961~1963年	
下降	增加	15.0	增加	增加	9.7
增加	下降	55.4	下降	下降	19.9

资料来源: 1.《1949~1986 陕西人口统计资料》, 陕西省统计局, 1987。

2.《1949~1985 浙江省人口统计资料汇编》, 浙江省人口普查办, 1986。

由于只是收集到浙江省与陕西省部分年份比较完整的小城镇人口资料, 因此只能对这两个省的小城镇人口规模体系作研究。不过这两个省分别代表了沿海与内地的情况, 应该可以说从大体上反映出全国的情形。表 3 中的数据说明了以下几点: (1) 人口规模在 2 000 至 10 000 人之间的城镇构成当时小城镇的主体。1957 年每个镇的平均人口 7 116 人, 1961 年 7 047 人, 1963 年为 7 568 人。(2) 在这期间, 人口规模小的城镇数量有大幅度的下降, 人口规模不足千人的城镇的比重从 1957 年的 4.7% 下降到 1963 年的 1.2%, 下降的幅度比较大。这种情况从一个侧面说明人口规模小的城镇对巨大社会变迁的适应能力比较低。(3) 在大跃进期间, 相当一部分人口规模大的城镇变成建制市, 到了困难时期, 这些城市又被取消建制, 因此导致人口规模在 5 万人以上的城镇比重大起大落。例如浙江的绍兴市在困难时期被撤消市建制, 成为一个非农业人口超过 10 万人的大镇。

表 4 浙江省、陕西省 1957~1963 年小城镇非农业人口规模分布 (%)

人口规模 (千人)	1957 年	1961 年	1963 年
< 1	4.7	2.0	1.2
1~2	12.1	11.7	14.5
2~5	39.3	45.2	45.0
5~10	24.6	19.6	18.3
10~20	12.5	14.8	13.9
20~50	6.2	6.7	5.6
> 50	0.6		1.5
合计	100.0	100.0	100.0
有资料城镇数 (个)	321	358	338

资料来源: 同表 3。

从人口学的角度看, 影响当时小城镇人口变化的主要因素有几个: (1) 小城镇建制的变化; (2) 人口自然变动异常; (3) 大量的人口迁移。下面就这几个方面进行初步分析。

## 二、小城镇数量变动

大跃进与困难时期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在小城镇的发展上同样显得如此。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小城镇数量的变动趋势是减少。在1953年，全国一共有5400个小城镇，1955年国家制定了设置城镇标准，估计有一部分人口规模小的城镇失去建制镇资格，因此城镇数量在大跃进前的数目会低于1953年，可能在5000个左右。到了1961年全国只有4429个小城镇，到困难时期结束的1963年只剩下4032个。当然各地的情况不完全一样，例如浙江省与陕西省小城镇数量的变化是有很大差别的（见表4）。

除了数量的变化之外，一些小城镇也在建制上频繁地消失与诞生。例如浙江省在1957~1963年间小城镇的数量变化幅度不如陕西省大，但是在1957年与1961年间在建制上消失了20个小城镇，同期新增加了61个小城镇；而在1961~1963年间在建制上消失了25个小城镇，同期新增加了4个小城镇。见表5。

表5 1957~1963年全国及浙江省、陕西省的建制镇数目 单位：个

项目	1957年	1958年	1959年	1960年	1961年	1962年	1963年
全国					4429	4219	4032
浙江省	199	226	231	229	240	251	219
陕西省	146	47	94	94	127	124	123

资料来源：1. 《中国人口年鉴198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854页

2. 《1949~1986陕西人口统计资料》，陕西省统计局，1987。

3. 《1949~1985浙江省人口统计资料汇编》，浙江省人口普查办，1986。

导致小城镇数量变化的最主要原因是大跃进与困难时期巨大的社会变迁，除此之外还有3个重要因素，一是人民公社运动，二是大规模的行政区划变化，三是大跃进的盲目建设。

在大跃进之前，乡、镇同样是县以下的一级行政区域，人民公社成立后，人民公社集党政、经济、文化等各种功能为一体，政社合一的体制把乡的行政功能完全取代了，在许多方面也把镇的行政功能取代了，这就导致了人口规模小的城镇消失。例如陕西省在大跃进最高潮的1958年城镇数量从上年的146个减少为47个，减少幅度达到67.8%。

大跃进与困难时期是当代中国行政区划变动最强烈的时期之一，在1957年全国有2092个县级行政单位，到1958年仅剩1748个，1959年又进一步下降到1688个，与1957年相比，1959年全国的县级行政单位只有1957年的80.7%。从1960年开始，县级行政单位数量回升，到1962年全国县级行政单位2075个，1963年2101个，<sup>①</sup>超过1957年的水平。中国的县城一般是小城镇，因此县级行政单位数量的变化自然会影响到当时小城镇数量的变化。

在大跃进中，许多建设项目一哄而起，随之而来的是一批小城镇伴随着工厂和矿山应运而生。到了困难时期，这些仓促上马的企业纷纷下马，相应的小城镇也就消失了。

## 三、人口的自然变动

大跃进与困难时期人口严重损失，从人口的自然变动来看，主要表现为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在部分地区出现了人口负增长（死亡率超过出生率）的情况。当时的情况是城市

<sup>①</sup> 陈潮：《中国县市区沿革手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版，第211页。

人口的死亡率远低于农村，绝大部分人口负增长的情形发生在农村。作为介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小城镇，其人口变动是怎样的呢？

从笔者所收集到的部分城镇的资料看，各地小城镇的人口自然变动情况相差很大，有的小城镇也出现了相当严重的人口损失，也有的小城镇人口的自然变动比较平稳。表6中列举了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江苏省吴江县盛泽镇、四川省长寿县城关镇和云南省通海县秀山镇的人口自然变动，从中可以看到玉山镇1960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是8‰，盛泽镇在1960年还没有出现人口负增长，长寿县城关镇是-7‰，秀山镇则是-23‰。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江苏省吴江县盛泽镇出现人口负增长的年份均只有1年，而四川省长寿县城关镇和云南省通海县秀山镇出现人口负增长的年份都是3年。一般说来，小城镇的人口自然变动与其所在地的人口自然变动紧密联系，昆山与吴江所在的苏南地区在困难时期人口损失比较小，因此玉山镇和盛泽镇的人口变动也小，四川与云南在困难时期人口损失都比较严重，因而其小城镇的人口变动也大。

表6 部分镇的人口自然增长情况(‰)

镇	项目	1957年	1958年	1959年	1960年	1961年	1962年	1963年
江苏省	出生率	37	28	27	23	19	29	36
昆山市	死亡率	8	11	11	15	17	12	11
玉山镇	自然增长	29	17	16	8	2	16	25
江苏省	出生率	35	27	26	12	15	24	32
吴江县	死亡率	11	13	14	10	20	14	10
盛泽镇	自然增长	24	14	12	2	-5	10	22
四川省	出生率	45	38	17	15	16		60
长寿县	死亡率	11	12	18	22	17		9
城关镇	自然增长	34	26	-1	-7	-1		51
云南省	出生率	22	23	11	13	11	36	46
通海县	死亡率	11	21	27	36	23	11	11
秀山镇	自然增长	11	2	-16	-23	-12	25	35

资料来源：1.《昆山市玉山镇志》，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00页。  
2.《长寿县城关镇志》（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藏书），第17页。  
3.《秀山镇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9页。

如果把小城镇的人口自然变动与其周围的乡村比较，可以看出镇的人口在人口损失方面远比乡村要低。虽然地处江南，但是吴江县的平望乡在1960与1961连续两年出现人口负增长，而平望镇却没有出现人口负增长。由于中国在粮食统购统销后，对城镇非农业人口的粮食实行低水平的定量供应，在困难时期虽然供应水平下降，但是最低的生存水平还是达到了，因此人口的非正常死亡相对于周围农村会少点。见表7。

#### 四、人口的迁移变动

大跃进与困难时期是当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人口迁移高潮时期，<sup>[4],[5]</sup>大量的人口迁移同样发生在小城镇。由于小城镇的人口规模小，因此有一定数量的人口迁移就显得迁移的幅度很大。根据少数有当时人口迁移资料的小城镇的情况，小城镇的人口迁移幅度之大是罕见的，不少城镇在一些年份总人口迁移率超过20%，甚至个别有超过70%的。从现有的资料看，在大跃进与困难时期人口损失大的城区，小城镇人口迁移的幅度大，反之则小。例如四

川长寿县城关镇的人口迁移率比广东增城县的荔城镇、江苏昆山的玉山镇要高许多。

表7 江苏吴江县平望镇与平望乡人口变动比较 (%)

项目	镇或乡	1957年	1958年	1959年	1960年	1961年	1962年	1963年
出生率	镇	36	12	20	39	19	26	39
	乡	26	29	24	16	17	18	31
死亡率	镇	11	3	8	21	17	11	8
	乡	12	11	15	23	21	8	10
自然增长率	镇	25	9	12	18	2	15	31
	乡	14	18	9	-7	-4	10	21

资料来源：《平望镇志》，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74~79页。

在大跃进时期有不少重大建设项目上马，在这些项目的所在地迅速形成一些小城镇，这些城镇在困难时期有的被取消，有的则大量压缩人口，形成了大量的人口外迁。从青海省的大柴旦镇的人口迁移变动就可以大体上了解这种变化。详见表8。

表8 部分镇的人口迁移增长情况 (%)

镇	项目	1957年	1958年	1959年	1960年	1961年	1962年	1963年
长寿县城关镇	迁入率	23.6	26.9	31.3	27.2	23.1		9.0
	迁出率	14.4	33.3	22.6	20.7	44.0		10.1
	净迁移率	9.2	-6.4	8.7	6.5	-20.9		-1.1
	总迁移率	38.0	60.0	53.9	47.9	67.1		19.1
昆山县玉山镇	迁入率	11.7	12.2	9.0	10.9	7.9	4.6	3.5
	迁出率	11.1	11.5	8.0	11.5	9.0	11.3	5.7
	净迁移率	0.6	0.6	1.0	-0.6	-1.1	-6.7	-2.2
	总迁移率	22.8	23.7	17.0	22.5	16.8	15.9	9.2
吴江县盛泽镇	迁入率	4.8	4.6	6.7	2.4	1.9		
	迁出率	3.6	4.8	3.6	5.8	1.0		
	净迁移率	1.2	-0.2	3.1	-3.4	0.9		
	总迁移率	8.4	9.4	10.3	8.2	2.9		
增城县荔城镇	迁入率	6.2	3.6	11.9		3.7	4.5	4.1
	迁出率	6.0	4.1	8.6		3.5	7.2	4.7
	净迁移率	0.2	-0.5	3.3		0.2	-2.7	-0.6
	总迁移率	12.2	7.7	20.5		7.2	11.7	8.8
青海省大柴旦镇	迁入率			55.2	0.3	4.0	19.6	1.4
	迁出率			18.6	14.3	3.6	17.4	5.4
	净迁移率			36.6	-14.0	0.4	2.2	-4.0
	总迁移率			73.8	14.6	7.6	37.0	6.8

资料来源：1.《昆山市玉山镇志》，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00页。

2.《长寿县城关镇志》（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藏书），第17页。

3.《荔城镇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0页。

4.《青海省人口统计资料》，青海省统计局1987年。

5.《盛泽镇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2页。

当年小城镇的人口迁移原因主要是整个国家社会经济动荡的结果。在困难时期，全国大

规模下放城镇人口，小城镇也不例外。云南秀山镇在 1959 与 1960 年一共下放 2 422 人，相当于 1958 年人口的 19.4%。<sup>①</sup> 在压缩城镇人口的过程中，有的城乡通婚者被转为农村人口，例如云南的秀山镇有 48 位城乡通婚者被转为农村人口，占 1959~1960 年间被下放人口的 2%。<sup>②</sup> 在困难时期下放的人口中，有一部分是在大跃进期间迁入城镇的农村人口，例如江苏盛泽镇在 1958~1959 年从农村净迁入 418 人，1960~1961 年则向农村净迁出 438 人，在 1958~1961 年间盛泽镇与农村的人口净迁移几乎是零。根据盛泽镇的资料，在当时小城镇人口还是向大中城市流动，该镇在 1958~1961 年间向大中城市净迁出 338 人，<sup>③</sup> 大体相当于该镇 1961 年人口的 1.4%。

人口迁移，特别是人口下放，对小城镇的人口就业结构发生相当深刻的影响。以江苏吴江县平望镇人口的就业结构（不考虑其中的渔民）为例，在 1957~1963 年间，就业人口中商业的从业人员的比重从 52.6% 下降到 31.3%，<sup>④</sup> 由此可见，当年城镇人口中的商业人员在下放人口中可能占的比重会高于其他职业。

## 五、讨论

虽然大跃进与困难时期已经过去将近半个世纪了，但是对这一时期的历史回顾还是有借鉴价值的。从深层因素看，导致小城镇人口变动的主要原因是：大跃进与困难时期巨大的社会变迁、人民公社运动、大规模的行政区划变化和大跃进中的盲目建设。虽然今天的情况与当年有巨大的差别，不过有些类似的因素自然存在，比如一些小城镇在建设项目上的盲目性、一些小城镇主要是依靠行政中心而生存，因此深受行政区划变动的影响。

小城镇的发展是中国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从历史经验来看，一个小城镇发展成功与失败的风险同样都比较突出。由于其人口规模不大，抗御外部变化的能力也就比较低，在巨变的年代，相当一部分小城镇是否能在变革中脱颖而出恐怕是个问题。

### [ 参 考 文 献 ]

- [1] 李成瑞. 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 [J]. 中共党史研究, 1997 (2).
- [2] 李若建. 大跃进后人口损失的若干问题 [J]. 中国人口科学, 1998 (4).
- [3] 李若建. 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家庭、婚姻与生育研究 [J]. 开放时代, 2000 (5).
- [4] 李若建. 大跃进与困难时期人口迁移初步探讨 [J]. 中山大学学报, 1999 (1).
- [5] 李若建. 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流动人口 [J]. 中国人口科学, 2000 (4).
- [6] 李若建. 大跃进时期的城镇化高潮与回落 [J]. 人口与经济, 1999 (5).

(责任编辑 许玉兰)

①②《秀山镇志》，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9 页。

③《盛泽镇志》，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2 页。

④《平望镇志》，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77 页。

## Population Change in the Small Town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the Hard Times

*Li Ruo-jian*

**Abstract:**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the Hard Times, the population quantity and population composition of the small town underwent great changes. The direct cause of these changes was the change of population fertility, mortality and migration. The basic reason was the great social change during the period.

**Keywords:** population change; small town; Great Leap Forward

---

(上接第 85 页)

## Studies of the Reasons for the Constructing of Qian Jia School's Textual Criticism in the 20<sup>th</sup> Century and Problems Concerned

*AO Guang-xu*

**Abstract:** This paper is intended to review the studies of the reasons for the constructing of Qian Jia School's textual criticism since the 20<sup>th</sup> century. Four main problems concerned with these studies are pointed out: 1) Confusion in concepts has led to ambiguities and shifts of topics. 2) Lacking of accurate description and definition of the formation and the period of the school has led to disorders of time and space and contradictions in representation. 3) The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and "internal textur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fucian School have been overstated. 4) Total repudiation and the "potato-piling" way of reasoning are common practice. In addition, it is emphasized that the bursting out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resulted from the power shift from Han of the Ming Dynasty to the Manchu of the Qing Dynasty has been the key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Qian Jia School. Unfortunately, this reason has long been ignored.

**Keywords:** Qian Jia School's textual criticism; reasons for constructing; problems with studies; key factor; national consciousness